

【聊斋之爱】

□马瑞芳

2008年《画皮》首发式前,我接到中央电视台“电影传奇”栏目邀请,到蒲松龄故居与崔永元及《画皮》剧组主创人员做节目。我来到淄川某宾馆,小崔把他的手提电脑交给我,“看看未经剪裁的《画皮》!”将要公映的《画皮》片长90分钟,小崔电脑里的片长120分钟。

我和先生一起看片,看到90分钟,按常规已是电影结束的时间,我纳闷地问先生:“蒲松龄写的那张皮,在哪儿啊?”

差不多看到100分钟时,“画皮”千呼万唤始出来,不是恶鬼的美女画皮,是白狐狸精的皮;不是恶鬼把人心掏走了,是狐狸精来了番心灵救赎,自我完善。如此高谱,能叫“根据《聊斋志异》改编”吗?

在午餐餐桌上我对小崔说:“这片子跟聊斋原文距离真够远的,但我估计它能拿到票房两亿。”

“票房两亿?”小崔说,“那制片方就乐死了。他们担心收不回投资呢。”

开始录制节目,小崔说:我们今天的“电影传奇”不在录制棚里,在蒲松龄故居,坐在我们身后聆听我们谈话的就是蒲松龄先生。我不能保证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叫他老人家满意,所以我代表今天所有要说话的人先给老人家鞠个躬。

好聪敏机灵的小崔!有他

【名家背影】

□智效民

据说,梁漱溟(见右图)一生只有一个外国朋友,这就是“性格古怪的德国音乐家卫西琴”(见[美]艾恺《梁漱溟传》)。梁先生特立独行,交友慎重。泰戈尔访华时,二人在徐志摩撮合下见了一面。泰翁对他十分欣赏,他却没有把对方引为同调。于是人们不禁要问,梁为什么会选择一个“性格古怪”甚至被视为疯子、骗子的人做朋友呢?

卫西琴(Alfred Westarp)又名卫中,是一位德国银行家的儿子。由于性格古怪,妻子说他是疯子,他自己也看不惯周围的一切,于是他决意离开德国。此后,他在法国参观美术展览时发现了东方文化的魅力,在英国接受了蒙台梭利的教育思想,最后于民国初年经印度来到中国。卫西琴说,他本来对中国文化非常崇拜,不料到了上海后却极为失望。他发现,中国人正在盲目模仿西方,从服饰、建筑到教育、音乐,到处“都是让我仇恨的”东西,至于中国固有的文化和精神,却无处可寻、无人可问。两年后他离开上海去了日本。

过了半年,卫西琴“接到北京的电报”再度来华。他在北京仅仅住了三个月,就买好船票又要离开。他认为,日本已经渡过模仿的时代,“中国却正在模仿的路上”。正在这时,严复来信挽留,原因是翻译他所写的《中国教育议》。梁漱溟说,这篇论文在《庸言》发表时,“颇为士林瞩目”;但他拜读后,却有一种条理不清、空有慨叹的感觉。他又找到卫氏的其他著述,反复研读,仍然是“莫窥究竟”。他怀疑此人学问空疏、言之无物。

由于严复的推荐,卫西琴在天津中国教育联合会演讲多次,并与社会名流多有接触。尽管如此,他还是难觅知音,只好到保定去教音乐。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,他“声明改入美国

电影画皮和聊斋画皮

聊斋天马行空,20世纪才完成的现代医学难题如心脏移植,在聊斋易如反掌,还能用如此不可思议的心脏移植“备体”。

鞠的这个躬,后边的话就好说了。不管改编者做了什么令作者想不通的“改编”,不管谈话者说了什么不着调的话,大人不计小人过,古人不计今人过,蒲松龄都会网开一面吧?

我说:“今天见了制片人,想说的第一句话,就是‘你们真敢编啊’!今晚的首映式将在蒲松龄墓地举行,如果蒲松龄有灵,他会从坟墓里站起来,好奇地说:现代人喜欢学雷锋,这是什么人编了出这么好玩的剧栽到我头上啦?”台下笑声轰响。

在场有许多平面媒体人,有记者把这番话引用到报纸上,标题是《马瑞芳:这不是聊斋那张皮》。

在录制现场,我继续说:我相信这个电影能受到观众追捧。第一,有东方魔幻色彩,惩恶扬善,本质上和聊斋精神相通;第二,采取好莱坞大片模式,大漠、荒野,哥特式故事背景,神秘、诡异,给人惊悚感;第三,人物关系上采取甲爱乙、乙爱丙、丙爱丁、丁爱甲……转着圈儿爱,这是当代年轻人喜欢看模式。

五个月,我参加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波兰,刚到华沙,就接到小崔的短信:“马老师言中,《画皮》票房直追两亿。”

这个世界很精彩,这个世界很无奈,打着《聊斋志异·画皮》旗号,离聊斋扯出八丈远,

偏偏卖座!

那么,《聊斋志异·画皮》是个什么故事,给人什么教益?

太原王生,早上外出,遇到个美女,带回家同居,没想到美女是恶鬼,把王生的心掏走了。恶鬼披上画皮变成美女,掏走受迷惑者的心,成为中国古代小说对恶鬼的经典性描写。《画皮》成了聊斋最脍炙人口的篇章,是最具有“黑色性”、淋漓尽致写恶鬼的代表作,读之惊心动魄。

王生的妻子陈氏要求道士救活王生,道士说我没这个能力,你到市上求那个躺在粪堆里的乞丐,记住:不管他怎么羞辱你,你也照他的要求办。陈氏到了市上,“扑通”跪在乞丐面前求救命。真人不露相的乞丐羞辱陈氏说:佳人爱我哉?救活这种丈夫做什么?随便拉个人做丈夫也比这种人强!还拿拐杖打陈氏,陈氏强忍住。最后乞丐又擗又吐,捧出一大团鼻涕黏痰,命陈氏吃下去!

陈氏求乞丐这一段让人不忍卒读,陈氏本是个不会跟丈夫之外的任何男人发生联系的良家女子,竟然为了见异思迁的丈夫,光天化日在众人围观下,承受这么长时间又花样翻新的羞辱!而这一切都是品行不端的丈夫造成的!

陈氏想到道士的嘱咐,忍着莫大羞辱把那团鼻涕黏痰吞下去,奇迹并没有发生。陈氏回

到家,越想越窝囊,丈夫救不活,自己还吃了一个脏男人的鼻涕和黏痰!这是多大耻辱!她一边哭一边给王生整理被恶鬼撕裂的胸膛,那团鼻涕黏痰突然涌了出来,掉进王生的胸腔,变成一颗跳动的心脏!陈氏赶快将丈夫的胸膛包扎起来,王生居然渐渐有了体温,第二天早上,复活了!神奇不?

聊斋天马行空,20世纪才完成的现代医学难题如心脏移植,在聊斋易如反掌,还能用如此不可思议的心脏移植“备体”——鼻涕和黏痰!21世纪现代医学仍未解决的难题如头颅移植,《陆判》玩笑般完成。20世纪好莱坞大导演吴宇森导演《变脸》费多大的事?《成仙》中两个朋友瞬间互相换脸。《丐仙》和《济南道人》创造出看得见却摸不着的美景,简直是三百年前的虚拟网!

法国作家克罗德·罗阿说:“《聊斋志异》是全世界最美的寓言。”

寓言的最终目的是一句道德教训,而《画皮》是两句——

一句是:要警惕披着美女画皮的恶鬼。

一句是:凡是见色起意的男人都有颗鼻涕和黏痰般肮脏的心。

(本文作者为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)

人们不禁要问,梁为什么会选择一个“性格古怪”甚至被视为疯子、骗子的人做朋友呢?

梁漱溟与卫西琴

籍”。大约在“五四”运动以后,卫西琴应阎锡山邀请到山西办学。当时,阎锡山正在山西大力推行新政。阎请他来,是要他主持外国文言学校。该校于1919年8月成立,据1921年编纂的《山西现行政治纲要》介绍,它的独特之处,一是“学生皆属十六岁以内,毕业后分送各国留学”,二是“学生每日工作二小时,盖合乎工读主义也”。台湾商务印书馆发行的《民国阎伯川先生锡山年谱长编初稿》也说:这所学校“采取自觉教育法,不雇工友,学生分工料理日常生活事项。(阎)先生常莅校与卫先生研究哲学,并为学生讲话。后改为‘大通学院’”。过去我既不理解“大通”的含义,又以为学校改名是阎锡山的主意,读了梁漱溟之后才明白其来历。梁在《介绍卫中先生的学说》中说:“他在教育中最要紧的意思,或其根本道理,就是感觉应当上通于心,心应当下通于感觉,往复相通不要隔离;所以他自名其在山西所办的学校叫大通学校。”由此可见,阎锡山对卫西琴相当倚重。

梁漱溟大约是1922年初与卫西琴订交的。1921年底,梁趁放假之机应邀赴山西讲学,顺便参观了外国文言学校。一年前,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在太原召开会议,卫西琴曾把《诗经》的几章谱成乐曲让学生演奏,在会上反响不错,可惜梁漱溟未能与会,没有听到这种“真可以代表中国民族精神”的音乐。这次参观,他既为卫西琴的献身精神所折服,又因该校的

不同凡响而惊叹。他说:“是冬游晋,得参观先生所主办之外国文言学校。则其间所有,举不同俗,一事一物,靡不资人省味……而窃见先生精神措注于百余学生之身,无微不至,直有欲呕出心肝之慨,尤不能不使人起恭敬,倾心折服。学生百数十人,一一颜色泽然,神采焕然;凡外间一般学校学生,所有憔悴之色,沉闷之气,于此绝不可见。然学生肥而先生瘠。先生之劳瘁,睹面可识,不止于瘠,直已病矣!”参观后经过一夜交谈,梁完全改变了过去的印象。他认为卫西琴不仅非常正直,而且胸怀远大。

关于这所学校的规模,各种资料说法不一。据有关部门民国九年(1920)三月公布的数字,该校共4个班,有教员20人、职员5人、学生220人。此外,当年《晨报副刊》在发表《卫中先生的自述》时,还刊登《卫西琴教育主张及其办法》一文,对相关情况有所介绍。文章说,该校按语种分班,“每班一主任教员……名曰家长”,对学生的生活学习进行全面指导。“师生关系,若家长之于子弟,子弟之于父兄,互相亲敬,刻不可离。”学校没有固定教材,教学活动以实用和学生兴趣为主,日常生活中需要什么就学什么。卫西琴的出发点与“抢饭碗”的职业教育(蔡元培语)有所不同,他强调实用,是为了让学生摆脱“感官的模仿”,致力于“心力的创造”。

卫西琴大约是1925年年底离开山西的。之所以如此,用《晨报副刊》编辑的话来说,是



因为他“不谙中国风情,往往措施失当”,以及他反对山西人早婚,遭到山西人反对。按卫西琴的说法,是因为太原学生“总是要人化于乐,人化于文”。这话颇难理解,幸好梁漱溟作了笺注。他说,卫的意思,是指学生只知模仿不知创造,结果是“化于外物而失掉自己”。当然,更主要的原因,恐怕是卫氏学说过于抽象,过于晦涩,他的思想很难用准确而通俗的语言来表达,因此,不要说在普通人中间,即使在学术界也是和者盖寡。

卫西琴离开山西后又到北京,与梁漱溟、熊十力等人“在西郊大有庄租房……同住共学”,研讨儒家哲学与心理学,并以“每星期五为讲论之会”。经过一年相处,梁漱溟对卫西琴的学问、为人有了进一步的了解,二人友谊也日益加深。梁认为,卫西琴不为世人接受,除了性格上的原因之外,主要是语言上难以沟通。所以,他立志要以“将来的生涯与精力,划出一部分专替卫先生(的理论)作说明的工夫”。1926年,梁开始写《人心与人生》,历半个世纪之久,直到1975年才告完成,可见作者用力之深。该书除辟有专门章节介绍“亡友卫西琴”的学说外,其他部分也深受卫氏影响。梁甚至说,他的朋友也许就是那种生前不为理解,死后才被崇敬的大人物。梁先生是不随便恭维人的,他对卫西琴的推崇,值得我们注意。

(本文作者为文史学者,著有《长袍与牢骚》)

2014年春末,我与几十年没有谋面的师兄兼老师、暨南大学博导邱树森先生有一次晤谈,地点是在他大公子开的面馆。

难得一见,相谈甚欢,忆往事,忆故人,忆南京大学历史系几位已故教授。邱老师说:“陈恭禄的一本书在民国时期是很有名的大学教材。因为陈伯达评蒋介石的一本书中点了陈恭禄的名,1966年,‘文革’初,南京大学历史系开会讨论剥夺陈恭禄的各项政治权利,包括选举权。教职工都举手赞成,只有一人反对,这唯一的反对者就是王绳祖。”

邱老师所说的陈恭禄先生的一本书,指《中国近代史》,收入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著名的《大学丛书》。陈伯达评蒋介石的一本书,指《中国的

【学界往事】

风雨不改真君子

□王春南

四大家族》,陈伯达在此书中无端指责陈恭禄为“反动历史学家”,真是莫须有的罪名。

过了不到20天,我打电话给吴世民老师,向他请教一个问题,顺便提到了“文革”初南京大学历史系的那次会议,含有“求证”的意思。因为研究历史的人都知道,一个人说的是孤证,“孤证单行,难以置信”。我问:“‘文革’初,南京大学历史系讨论剥夺陈恭禄先生的权利,这事吴老师知道吗?”

吴老师是这样回答的:“‘文革’初,我在农村参加‘四清’运动,并未亲历此事。回校后,听说有此事。大家都举手赞成,就王绳祖先生一人没有举手。”

吴老师建议我向方之光老师求证。隔了几天,我打电话给方老师,他告诉我:“南大历史系的这次会议,我参加了。陈伯达早就点了陈恭禄先生的名。1966年5月,陈伯达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(5月28日,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设立“中央文革小组”的通知,通知中写明组长为陈伯达)。南大历史系按上面要求,在教学大楼(不久改称“文革楼”)开会讨论剥夺陈恭禄先生的各项权利。那时陈恭禄先生已患癌症,没有到会。王绳祖先生站出来反对。就他一人反对。这事是真的。其实陈恭禄先生连国民党都不是。他当年10月去世后,没有开追悼会,追悼会是1982年才开的。”

那次跟吴老师通话,他还说起了王绳祖先生的另一件事:“1958年,南大历史系组织批判陈恭禄先生的《中国近代史》,要求每个老师都要写批判文章,不论是教中国史的,还是教世界史的。我们都写了,只有王绳祖先生一字未写。陈恭禄的《中国近代史》、王绳祖的《欧洲近代史》,都被收入了商务印书馆的《大学丛书》,奠定了他们各自的学术地位。把1840年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,就肇始于陈恭禄的《中国近代史》。”

陈恭禄先生因为在教会中学、大学学习、执教的历史,因为成名在民国时期,因为被陈伯达定为“反动历史学家”,1949年以后没少挨批判。1958年“史学革命”中批他;1966年“文革”初批他,那时他患癌症已到晚期,政治运动没放过他,当年10月8日就过世了。

陈恭禄先生因《中国近代史》而成名,又因《中国近代史》而罹祸。此书被封杀多年后,终于在近年重又出版了,这算是不幸中之幸。有生命力的书是封杀不了的。

1958年,王绳祖先生不写一字批判陈恭禄,需要顶住很大的政治压力。“文革”初,王绳祖先生公开反对剥夺陈恭禄的政治权利,也需要顶住很大的政治压力。这种政治压力,使很多人弯下腰来,王绳祖先生却岿然不动。正如古人所说,“风雨不改”,他在恶劣环境中不改节操,威武不屈。

王绳祖先生这样的知识分子,是民族的脊梁。可惜这样的知识分子太少了。

(本文作者为凤凰出版社资深编辑)